

翻译学认识论

Translatological
Epistemology

牛云平 著



科学出版社

Translatological Epistemology

翻译学认识论

牛云平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翻译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译者、读者、听众、观众等翻译现象中的认知主体,又包括语言文字、广义符号、意义、文体特征等认知客体。本书基于“翻译”和“translate”两个术语,探讨中西方翻译理论对主客体的研究理路的差异:中国的翻译学学理是人本主义的;西方的翻译学学理是物本主义的。通过详细研讨翻译学的核心问题——意义,本书指出,翻译现象中不同的认知主体并不共享同一个经验世界;意义并不内在于语言文字,而发生在人与语言文本互动的中途,所以流变不居;加了引号的“原作”也是认知主体主观构建的产物。

本书适合从事翻译学、语言学、语言哲学、心理学等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教师和学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学认识论 / 牛云平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03-047985-3

I. ①翻… II. ①牛… III. ①翻译学-认识论-研究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4226号

责任编辑:王洪秀 / 责任校对:张怡君
责任印制:张 倩 / 封面设计:铭轩堂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年4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6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1 1/4

字数:350 000

定价:8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河北省社会科学重要学术著作资助出版项目

河北省中国语言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培育项目经费资助出版

序

翻译实相溯源

翻译学认识论

Translatological Epistemology

科技昌明，使世界变小，人类变大。信息传播手段和交通手段的深刻变革已将地球浓缩为一个村落；即时通讯空前便捷，可使东西半球鸡犬之声相闻。与此同时，人类智慧迅速扩展，宇宙微波和基因沉默都已纳入知识范围。因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更加依赖翻译活动，翻译学的新进展也更加注重对人本身的研究。

我将翻译学体系分为玄翻译学、元翻译学、泛翻译学三个部分。玄翻译学又可称为玄理翻译学，是关于翻译理论的理论，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翻译哲学。它作为一系列根本规则高悬在元翻译学和泛翻译学之上，监督着元、泛二学的构建是否合理，推动着二者朝良性方向发展。元翻译学即本体翻译理论，主要包括翻译理论、翻译批评和应用翻译技巧三个分支。泛翻译理论即与本体翻译理论或翻译现象相关的非本体翻译理论，很多时候是指翻译学与其他学科相关的交叉论述或跨学科论述。玄翻译学、元翻译学、泛翻译学三部之中，元翻译学是核心，考察的是狭义翻译所谓的语言文字之转换现象。从这个意义上看，翻译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语言文字的本质是什么？语言文字与人心和物质世界之间是什么关系？

言、文、心、物问题既是翻译学、语言学问题，更是关乎人类生存、世界构造、人心如何认知存在、存在如何作用于人心的根本性哲学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印度教、佛教、易经、老庄、基督教及柏拉图等历代哲学家都提出了各具特色的解答。实际上，以诸如此类的教义和哲学为基础，都可以建立起相应的翻译理论。举个简单的例子。例如，运用道家学说原理，即可建立道家翻译学原理。道家翻译学的根本原理是道法自然论。按照道家哲学原理，人和宇宙之间具有互根互构互补互彰的全息对应象同构关系。我曾在 90 年代把这种想法称为生态翻译学原理。那时我还没有发现别人有这样的提法。但是，我并没有

具体创建这一体系。10多年后的2003年,在香港浸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胡庚申教授邀请我做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会委员,并征求我对他所撰写论文的看法。他说他想提出“进化论翻译学”。我说,与其使用“进化论翻译学”这个用语,不如使用“生态翻译学”这类提法。庚申教授当即采纳了这个用语。但是,要指出,我最初要创建的生态翻译学是要以道家学说原理作为生态翻译学的基础,而不是要运用19世纪才产生的达尔文进化论作为其理论基础。至于西方20世纪才产生的生态学,其基本原理其实早就在中国道家学说、易经原理中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进化论与生态学有联系,但也有很大的区别,不宜混同。庚申教授采纳我提出的“生态翻译学”这个用语按照他自己掌握的西式理论范式而努力探讨生态翻译学的建构理路,虽然与我的初衷很不一样,但我还是肯定他的积极的探索精神的。理论建设的途径宽阔一点总是好事。对于当代中国翻译学来说,这样的尝试是值得鼓励的。

应该提到的是,翻译和翻译学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其实更为密切。如果能够运用新的语言学理论来建构新的翻译学,也许更具有针对性和实际应用性。例如,我曾建构了互构语言学和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用它们来对上述翻译领域的问题作出系统阐释,也是一条路子。互构语言学指出,语文结构和存在结构具有共生互动互补互斥互构互控的辩证关系,二者能够发生相互作用依赖的中介是人。通过人这个翻译机器,存在转化为语文,语文模拟并建构拟存在。人凭借其感官和意念持续往复于语文与存在之间,而千头万绪、念念不息的人心,始终从事着对语文和存在的翻译,也因而始终参与着对语文和存在的双向构建。在这个意义上讲,言、文、心、物多位一体,统摄于人的认知。

互构语言文化学则指出,语言文字作为人类文化的最重要载体,在被创造出来之后,又作为一种具有强大纵向诱导、暗示力的客体因素,潜移默化地制约着人类文化的发展形态和发展方向。现有的中西文化差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受这种差异结构制约的。更具体地讲,中西翻译学既起始于对语言文字的比较研究,又借助语言文字而存在;二者特色鲜明的发展形态和发展路向就提供了一个展现语言、文字纵向诱导暗示力的样本。2008年9月13日,我在中国外文局作了中西语文差异与中西翻译学差异的讲座,具体阐述了这一思路。讲座全文7万多字,最初以“从中西语文比较看中西文化与翻译”为题,发表在《纵

横：翻译与文化之间 II》（外文出版社，2011 年 1 月版）上，最近经过仔细修订重新发表在《译苑新谭》2015 年第七辑（2015）上，并获该刊颁发的“学术贡献特别奖”（2015）。从比较语言文化学角度探讨跟语言文字关系最密切的翻译学问题，我想这应该是最有前途的翻译学研究。

这正是牛云平教授《翻译学认识论》一书的出发点。

此书基于她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的博士学位论文。在这项属于元翻译学范畴而兼具一定玄翻译学和泛翻译学特征的研究中，她敏锐地意识到，学科大厦的建造直接受制于语言文字这一质料，正如希腊罗马古代建筑以石料为主，故此风格硬朗而粗重；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料为主，故此风格精巧而灵动。在翻译学科，最重要的质料莫过于“翻译”、“translate”这类基本术语。基本术语的功能相当于学科大厦的顶梁柱，它的结构特征决定了学科大厦的造型、高度和强度。牛云平教授充分运用古今资料，探索了中西翻译学之基本术语“翻译”与“translate”的语义源流和谱系结构，发现两词的语义基因诱导了中西翻译学各自核心问题的发生，制约着中西翻译学各自演进方向的选择。她论证出，“翻译”是人本主义的，而“translate”是物本主义的；从而导致中国翻译学和西方 Translation Studies 同样具备这种特征。在翻译学界，这应是第一次从本学科的根本术语着手进行中西学理比较的尝试。

在语言文字比较的基础上，牛云平教授又上溯到人类认知问题，从神经生理学、认知心理学和哲学认识论等角度描述了人类认知的生理基础和心理特征，提出了将人类认知具象化的“贝壳形认知经验世界”概念。她认为，每个人的“贝壳形认知经验世界”就是每个人之“我”。也就是说，“我”就是每个人天赋潜能、物质性生存环境和精神性生存环境的复合结构。言、文、心、物摩荡相生，都存在于“我”这个复合结构的不同维度上，为认知所统摄。这是本书中最富有哲学意味的内容。明白这一点，就探得了“心物一元”、“心生万物”的深意。

在提出自己关于认知问题的核心观点之后，牛云平教授据此综合运用演绎推理和实证研究方法考察了翻译学中的作者、译者、读者等认知主体，审视了文本、语言、意义等认知客体，得出了符合逻辑的看法。尤其是她对翻译学中自然主义态度谬误的三重驳斥，说理颇为透彻，立论可信。在目前的元翻译学理论研究沉寂期，此书亮出诸多新论点，必可嘉惠学林，激发许多新的译学思考。

我在玄翻译学中指出,理论的创建常常受制于创建者的个性或人格。牛云平教授当初刚刚考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成为翻译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时,我就很惊讶她的哲学思维能力。因为在我印象中,女士一般喜欢具体的文本研究而不喜抽象的哲学研讨,而她却常常和我畅论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显得非常投入。我曾经为北京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过10年的“西方学术精华概论”课程,其中的主要内容是西方哲学史,牛云平同学每课必到,还做了详细笔记。从她的期末论文试卷看,她对很多问题都有深刻的思考。就在两个多月前,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邀请北京大学哲学系徐龙飞教授作“《圣经·创世记》和《起世因本经》比较研究”的讲座时,没想到远在河北大学的牛云平教授还专程跑来听讲,她坐在讲堂最后排,向我这位讲座学术评议人提出如何用佛学阐释物质和宇宙的起源问题,让大家吃了一惊。记得我当时是用佛学的缘起说来阐释的,即①业感缘起;②赖耶缘起;③真如缘起;④六大缘起;⑤七大缘起(采用冯达庵先生的归类法)。讲座之后,她还问了我许多问题。她完全是个哲学迷。

这位温和谦逊的女士有多种译作问世,在学术上却并不偏好具体入微的文本比对,而独独钟爱思辨性极强的理论研究,我想这和她酷爱哲学是分不开的。她同时显示出不盲从成说、善于独立思考的个性特征。她读书治学毫不拘泥,故往往能发他人所未发,犀利地提出许多视角宏观、具有根本性质的学术问题。她卓有才识,敢于啃硬骨头,不但综炼史哲,而且出入文理,故能多方求证、立论有据。此书就表现了她为解答翻译学中的认知问题而勇于打破学科壁垒的气概,以及力求在学术研究中左右逢源的进取精神。这种气概和精神是做好学问、大学问的一个必备条件。我坚信牛云平教授能够继续发扬其勤学善思的优长,在翻译学与比较文化研究领域更上层楼,做出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辛正坤

2016年2月

于北京大学畅春园

目录

CONTENTS

翻译学认识论
Translatological Epistemology

序：翻译实相溯源（辜正坤）

绪 论 1

第一章 语文诱导认知：殊途异归的中西翻译学理 15

第一节 为何要比较“翻译”和“translate / translation”？ 17

第二节 “翻译”与“translate / translation”的语义谱系对比 19

一、“翻译”之语义谱系 21

二、“translate / translation”之语义谱系 39

第三节 “翻译”与“translate / translation”概念比较 50

第四节 本章小结 55

第二章 翻译学学科版图中的认识论 59

第一节 西方翻译学的学科版图 61

一、威尔斯之前的几种学科版图 61

二、威尔斯提出的学科版图 62

三、霍姆斯提出的学科版图 63

四、范德皮特提出的学科版图 65

第二节 中国翻译学的学科版图 66

一、董宗杰先生提出的学科版图 66

二、桂乾元先生提出的学科版图 67

三、方梦之先生提出的学科版图一 68

四、谭载喜先生提出的学科版图 69

五、金隄先生提出的学科版图 70

六、刘宓庆先生提出的学科版图 70

七、徐盛桓先生提出的学科版图 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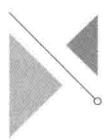
八、杨自俭先生提出的学科版图 73

九、金文俊先生提出的学科版图	73
十、陈福康先生提出的学科版图	74
十一、范守义先生提出的学科版图	74
十二、方梦之先生提出的学科版图二	76
十三、辜正坤先生提出的学科版图	78
第三节 中西方翻译学版图对比	79
第四节 认识论视角下的翻译学版图和翻译学认识论版图	82
第五节 本章小结	86
第三章 人类认知原理：从神经细胞到贝壳形认知经验世界	89
第一节 翻译学中的认知研究历史	91
第二节 人类生理与心理认知机制述要	99
一、认知与认知机制的概念界定	101
二、人类生理认知机制略论	101
三、人类心理认知机制：“心”理即“脑”理	115
第三节 哲学认识论中的两大传统	116
一、先验论认识论	117
二、经验论认识论	124
第四节 认知基因型与认知表现型	129
第五节 作为先验与经验之复合物的认知表现型	130
第六节 作为认知表现型的贝壳形认知经验世界及其特征	135
第七节 本章小结	145
第四章 翻译现象中的认知主体：理解即创造	147
第一节 关于荷马风格的争论	150
一、荷马史诗英译小史	150
二、阿诺德等五人对荷马风格的判定	151
三、寻找答案：五种贝壳形认知经验世界	157
四、“真相”受造于认知者的贝壳形认知经验世界	167
第二节 译者的认知创造：对自然主义态度谬误的驳斥之一	175
一、译者与作者成竞赛对手关系	176
二、作者—译者的二位一体关系	180

三、作者对译者的主仆掌控关系	194
四、译者对作者的凌驾掌控关系	204
五、作者—译者平行关系	216
六、作者（意图）是译者建构的结果	221
第三节 译品意向对象的认知创造：对自然主义	
态度谬误的驳斥之二	222
一、意向对象的功能	222
二、意向对象的分类	224
三、意向对象是译品意义的创造者：调查与个案分析	227
第四节 从“接受者”到“创造者”：对自然主义	
态度谬误的驳斥之三	235
第五节 本章小结	236
第五章 翻译现象中的认知客体：一与多	239
第一节 对文本的认知：一与多	241
一、文本的形成与威权的确立	241
二、文本在译学界的地位	248
三、从贝壳形认知经验世界理论看文本的性质	251
第二节 对语言的认知：一与多	254
一、从贝壳形认知经验世界理论看意义的所在问题	254
二、从贝壳形认知经验世界理论看语言的公私属性	
及其对于翻译学的影响	265
第三节 本章小结	268
结 语	271
参考文献	275
附录：调查问卷	303
“翻译作品理解的制约因素”调查问卷一	303
“翻译作品理解的制约因素”调查问卷二	308
“翻译作品理解的制约因素”调查问卷三	311
“翻译作品理解的制约因素”调查问卷四	313

“翻译作品理解的制约因素”调查问卷五	314
索 引	320
后 记	323

绪 论



翻译学认识论

Translatological Epistemology

一、翻译之为用也大矣哉！

世界有今日璀璨之人类文明，中外有今日昌明之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无不贯穿着翻译之功。部族之间、地域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交往与沟通，乃至军事行动，都有赖于懂双语或多语的专任或兼任译者提供的翻译服务。

据《史记·五帝本纪》，在我国上古时代，黄帝轩辕：

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黑貔貅羆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北逐荤粥^①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②

其中的诸侯、四方、荤粥、万国，都是黄帝部落之外的其他部落，黄帝部落与之交往沟通，必仰赖通其言语之人。另据《尚书·虞书》记载，尧帝去世后，舜守丧三年毕，在新一年的正月一日回到文祖庙，与十二州的行政长官谋划道：“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③意即民以食为天，君长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民谋食。你们要敬授民以天时，不要扰乱了农业生产！为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抚好远民，就能安近人。要厚行德信，为民之师长，淳化本地民风，使民众知善而从。还要拒绝邪佞之人，斥之远之，使不能干政，让忠德行昭显于边地四夷，他们自会相率而来，主动服从你们。舜又对皋陶说：“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④意即以前有蛮夷戎狄猾乱我华夏礼仪之邦，又有强寇劫贼，外奸内宄者，为害甚大。你作为士官，治理这些乱贼，能够明审详察，按照罪行轻重，分别处以墨、劓、剕、

① “荤粥”音xūn yù，古代居于华夏民族北方的游牧民族。南朝刘宋裴驷集解曰：“《匈奴传》曰：‘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唐朝司马贞索隐称：“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汉曰匈奴。”

② 参见[汉]司马迁（撰），[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2005.《史记》.北京：中华书局。第3-6页。

③ 参见[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2007.《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96页。

④ 同上。第100页。

宫、大辟五行。举措得当，罪犯都服从了。据《史记·五帝本纪·舜本纪》看，上述做法收效良好。

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枝、渠度、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①

根据许慎（约 58—约 147）《说文解字》之“译，传四夷之语者”的描述和界定，这十二牧行政官长在处理夷夏关系，以文德或武力令其服从时，必然要有人员居间从事翻译活动。例如，东汉王充（27—约 97）在《论衡·变虚篇第十七》中曾云：“四夷入诸夏，因译而通。同形均气，语不相晓。虽五帝三王不能去译独晓四夷，况天与人异体、音与人殊乎？”^②

在公元前 3500 年的两河流域，即亚历山大大帝用希腊语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地方，涌现了苏美尔人、阿卡德人、亚述人、巴比伦人等，他们使用苏美尔语、阿卡德语、巴比伦语等不同的语言，有着纷然杂陈的内部部落，占据的地域朝夕变化，建立的国家规模不一，国祚各异，各部落或国家的统治者及其名字也纷纭难辨。这些族群不断敌对和结盟，在分分合合中发展出了个性特征鲜明的文化。它们之间的交流、结盟与对抗都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进行口头或笔头信息转换。大约在公元前 3000 年，苏美尔人创造了图画文字，后来发展为楔形文字。楔形文字被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埃兰人、侵入今伊朗境内的波斯人等许多民族继承和发展，并被用作多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的文字符号。这些楔形文字有的用来表音，有的用来表意，有的用来混合表意。在语言文字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千型百态、程度各异的移植、音译、意译、再创造等翻译行为：巴比伦人继续使用口语中已经消亡的苏美尔语，把它当作祭神的语言，为此，巴比伦的僧侣们编写了双语词汇表和语法习题；波斯人会用三种语言撰写国王的碑文。这类多语文物不断被发现、累积，后世研究者们正是通过破译这些并行的古老文字的片段，补缀起远古时代的文明古国里发生的事情。

① 引自[汉]司马迁（撰），[宋]裴驥（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2005.《史记》.北京：中华书局。第32页。

② 参见[汉]王充.1974.《论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6页。

1799年，拿破仑军队中的一名上尉皮埃尔-佛郎索瓦·布沙尔（Pierre-François Bouchard）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港口罗塞塔附近发现了一块长约114厘米、宽约72厘米、厚约27.9厘米的黑色花岗岩石碑残段，石碑上刻写着古埃及象形文字（Hieroglyphic）、埃及俗书（Demotic）、古希腊文三种文字。研究者们发现，它是公元前196年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加冕后下令刻写的。这块三语碑表明，在古埃及托勒密王朝时代，翻译活动的覆盖范围很广，上达王命，下至黎庶。

在古罗马时代，南征北战的军队经常需要翻译人员的服务。据老普林尼的《自然史》记载，在黑海和里海之间的高加索地区，曾经生活着300多个部落，它们各有自己的语言；罗马商人追随着军队的步伐到那里做生意的时候，需要130个译员的帮助。^①从公元前3世纪起，罗马人开始大规模地翻译和模仿希腊的典籍，汲取比罗马更发达的希腊文化。荷马史诗，希腊主要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约前525—约前456）、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约前497或前496—前406或前405）、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约前480—前406）的悲剧，以及柏拉图、色诺芬（Xenophon，约前430—前354）、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等人的名作等，大量的希腊文化经典就这样得以继承和保存，古罗马的文化也由此走向发达。

成书于纪元前的基督教《旧约》在公元前3世纪从希伯来文翻译为希腊文，即《七十子希腊文译本》（*The Septuagint*），乃是西方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至公元1世纪之后，《新约》逐渐成书，此后《圣经》的多层次、多语种翻译不但促成了基督教的广泛传播，而且促成了历次宗教改革运动。这些宗教事件往往同世俗政治、经济和军事事件交织在一起，最终形成了现代的欧洲民族国家和西方文化形态。

由上可见，在古代早期，若没有夷夏文化区域之间的翻译，就没有历代中国概念和物理疆域的丰富与扩充；若没有古希腊文化典籍的翻译，没有《旧约》等宗教基本经典的翻译，就没有古罗马的文化繁荣，没有后来和现代的欧洲各国语言、文化和社会。

再回到中国来。中古时期，中国本土主流文化形态儒家经学在东汉末年盛极而衰，佛经汉译拉开帷幕，历魏晋时代与玄学交织互促的大发展，至南北

^① 参见Pliny. 1942. *Natural History* (Vol. II). Trans. by H. Rackha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349.